

A New Historicist and Cultural
Materialist Study of
Norman Mailer's Work

by Hongli Gu

谷红丽◎著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
批评视角下

诺曼·梅勒 的作品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厦.门.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博.士.文.库

A New Historicist and Cultural
Materialist Study of

Norman Mailer's Work

责任编辑 - 王扬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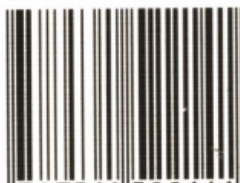
特约编辑 - 张龙海

装帧设计 - 李夏凌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视角下

诺曼·梅勒的作品研究

ISBN 7-5615-2214-2



9 787561 522141 >

ISBN 7-5615-2214-2/H·175

定价：21.00 元

厦. 门. 大. 学. 英. 语. 语. 言. 文. 学. 博. 士. 文. 库

*A New Historicist
and Cultural Materialist Study of*

Norman Mailer's Work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视角下

诺曼·梅勒的作品研究

谷红丽 著

by Hongli Gu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视角下诺曼·梅勒的作品研究/
谷红丽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 7

(厦门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文库)

ISBN 7-5615-2214-2

I. 新… II. 谷… III. 梅勒-作品-文学研究-汉、英 IV. I712.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548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福建二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240 1/32 印张:9.5 插页:2

字数:280 千字 印数:0001-1100 册

定价:2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A New Historicist and Cultural
Materialist Study of
Norman Mailer's Work*

作者简介

谷红丽，1968年生，河南叶县人。

1991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外语系，获学士学位，1994年获硕士学位。1995年9月调入海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工作至今。2000年9月考入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师从博士生导师杨仁敬教授，专攻美国小说史，2003年毕业，获博士学位。

1998年以来共发表学术论文15篇，译著一部，其中发表在《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译林》等核心期刊上的论文6篇。2001年-2003年参与完成了杨仁敬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的研究工作；2004年2月获得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诺曼·梅勒：后现代的异端”的立项。现为海南师范学院中青年学术骨干、外语系英美文学学科方向带头人、副教授、副系主任。

523
24/32
10

序

“杨老师，您好！我是海南师院外语系的老师谷红丽，想报考您的博士生，不知道您招生有内定的吗？”这已经是谷红丽同志第三次来电话了。与其他考生不同，她问的不是考试的范围或参考书的重点。她担心的是：如果有了“内定”，岂不是白考一场！

从当时的社会风气来看，她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没有！绝对没有内定对象。你放心吧考好了。我的录取原则是校内的考生与校外的考生一个样，认识的考生与不认识的考生一个样，应届硕士考生与教授、副教授考生一个样；择优录取。你成绩好，一定会录取的，不必担心。”

我明确地回答了她的問題。她也不再来电话了。

入学考试后，经过匿名评卷，谷红丽成绩优秀，果然被录取了。

美国著名作家富兰克林说：“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交谈使人清醒。”谷红丽同志来校后，很快适应了新的学习环境，投入紧张的学习。她天资聪颖，勤奋读书又善于思考，在课堂上踊跃发言，经常积极与导师和同学交流观点，进步很快。她读硕士时主攻英美诗歌，到了厦大则专攻美国小说。面对着一本又一本厚厚的英文长篇小说，她知难而进，一本一本地读，毫不气馁。经过一年半专业课的学习，谷红丽同志门门功课成绩优秀，2002年还被评为厦门大学的“三好学生”。

有了扎实的英语基础，又有了丰富的美国文学知识，这为她撰写学术论文创作了良好条件。但要写好论文，还要有一定的理论素养。谷红丽同志参加我的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的研究，剖析了女作家厄秀拉·勒·魁恩小说中科幻小说、后现

代主义艺术手法与中国道教思想的结合,很有创意。通过这次研究实践,谷红丽对后现代主义有了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在讨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我建议谷红丽同志写诺曼·梅勒。我同时指出:梅勒的小说和非虚构小说较多,篇幅较长,表现手法变化较大,不容易写,但根据她各方面的条件来看,完全可以写好。我们一起商定了撰写计划。我建议她动笔写以前再仔细读一读西方文论,尽量寻找一种新视角。她点点头,表示同意。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谷红丽同志决定选择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的视角来解读诺曼·梅勒的作品。这些理论大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和英国,国内学术界有些评介,但还不多。谷红丽同志在校内外图书馆搜寻最新的参考书,反复细读,摘录要点,将上述两种理论与梅勒作品的文本分析结合起来。她终于发现:诺曼·梅勒与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在关于后现代历史状况、历史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以及文学文本与政治意识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上都存在着极为有趣的共识。她越写越有信心。不久,博士论文终于完成了。

去年11月底,谷红丽同志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她在论文中运用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评析了“梅勒文本的历史性”和“梅勒历史的文本性”以及“梅勒文本的政治意识”,还解读了梅勒小说中的权力关系和政治斗争的策略与结果,令人耳目一新。她指出: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在赞同“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概念的同时,都认为文学文本是权力关系的载体,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矛盾和斗争,但在对颠覆者和颠覆行为的认识上,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存在很大的分歧。诺曼·梅勒作品中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对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的思考和表征,使他明显地区别于当代美国小说家索尔·贝娄、约翰·厄普代克等,也区别于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约翰·巴思、罗伯特·库弗和E.L.多克托罗。有人称他是“我们的惠特曼”、“文学社会学家”,她认为最恰当的头衔应该是“后现代的异端”。这些独特的见解是很有创意的。

谷红丽同志将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应用于诺曼·梅勒的作品研究,这种大胆的尝试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开拓性意义。

“梅花经雨香犹在,芳草留人意自闲。”谷红丽同志的论著体现了她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积极向上的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践证明:谷红丽同志在科研上是很有潜力的。不过,学术的道路是漫长的。博士论文的成功是个新的起点,任重而道远。但愿她继续弘扬这种求真务实和知难而进的精神,争取更大的成绩。是为序。

杨仁敬

2004年4月18日

于敬贤楼

前言

诺曼·梅勒(1923—)自1948年发表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以来,至今一直活跃在美国文坛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出现的极权主义或亨利·华莱士所担心的“新法西斯主义”倾向、美国梦与个人主义、反文化潮流、越南战争、美国总统的竞选、阿波罗11的登月创举与科技发展问题、影星玛丽莲·梦露的陨落、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杀人犯盖瑞·吉尔莫的行刑、肯尼迪总统的遇刺案,到2001年轰动美国社会的俄罗斯间谍罗伯特·汉森案等都是梅勒的作品中所关注的内容。他对于美国战后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生活的及时和深切的关注使他成了许多批评家眼中美国社会历史的代言人。他的一举一动几乎成了美国社会风云变幻的晴雨表。他的作品因而成为美国战后经典文库中不可缺少的不朽篇章。

即使如此,诺曼·梅勒似乎从来没有享受过美国文学批评界对他异口同声的赞扬,虽然他的《夜幕下的大军》(1968)和《刽子手之歌》(1979)曾两次为他赢得普利策文学奖,前者还使他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殊荣。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会引发美国批评界一片斥责之声,其声势往往大大超过他因此而得到的赞美。他在中国学界得到的关注则更加可怜。在浩渺的文学批评论著中,除了几篇关于他的《裸者与死者》(1948)、《夜幕下的大军》和《刽子手之歌》的学术论文之外,还没有一部有关他的专著。

无论诺曼·梅勒在文学批评界得到了怎样的关注和批评,他始终笔耕不辍。在长达5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共创作了近40部作品,其中8部长篇小说,5部

“新新闻体”的政治、科技和体育报道,4部非虚构小说,或梅勒所谓的“小说体传记”,或约翰·吉纳所定义的“传记体元小说”。梅勒的其他作品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访谈、杂文、书信、书评、前言、绪论、诗歌、戏剧和电影脚本等。

梅勒写作题材和写作主题的繁杂与多变、他本人的社会活动和私生活在媒体的频频曝光,使批评家更多地关注他作品中的思想内容、他的嬉皮士哲学和他的个性等方面的问题。梅勒作品中的艺术创造性在早期的评论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挖掘和评价。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发展为从艺术手法和主题两个方面全面评价梅勒的作品提供了新的批评视角和方法。罗伯特·比基宾从原型批评理论入手,探讨了梅勒作品中关于生与死的主题,而安德鲁·戈登则利用弗洛伊德以及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批评理论对梅勒的作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本书将以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于美、英两国,至今仍方兴未艾的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为理论指导,对梅勒的作品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当然,这两种批评理论与梅勒的文本分析的结合绝不是牵强和即兴的。本书认为诺曼·梅勒与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在关于后现代历史状况、历史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以及文学文本与政治意识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上都存在着极为有趣的共识。

本书第一章,“梅勒文本的历史性”,首先分析了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关于“文本的历史性”的观点,即文学文本不仅是特定历史状况的产物,而且能够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一种能动作用,能够参与到历史形成的过程中去,然后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指出诺曼·梅勒的文本不仅反映了他所处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状况,是历史的产物,而且他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在我们时代的思想意识中”掀起了“一场革命”,从而参与创造了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历史,形成了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批评所认为的文学与历史之间的那种互文关系。

从《裸者与死者》的发表到《大间谍罗伯特·汉森传》于2002年的问世,诺曼·梅勒一直处于美国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战后美国社会的主要历史事件几乎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其中美国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浸润在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极权主义倾向是他的作

品中最为持久和严肃的关注对象。

在梅勒看来,20世纪60年代晚期标志着—个新型科技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在美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拜,它极为广泛地控制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其实,普遍认为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社会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种新秩序不仅包括文化领域的后现代主义,而且是文化领域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经济领域的后现代化过程的辩证统一。信息与科技的新形式是这种后现代社会的明显标志之一。弗朗索瓦·利奥塔认为这是一个计算机化了的社会,鲍德里亚认为这是一个被遗传学、控制论和电视机所主导的社会,而梅勒则认为这是一个排斥和憎恨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所崇尚的自由和神秘的社会。梅勒认为,科技与文学相反,它与超验的神秘与浪漫的欲望无关,一切都是为了控制。因此,在梅勒的作品中充满着他对于科技的厌恶与批判。除了《鹿苑》(1955)、《一场美国梦》(1965)、《我们为什么呆在越南?》(1967)等小说之外,《月球之火》(1970)是他的这种批判态度的集中体现。

梅勒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所关注的另一个美国社会现象是极权主义。梅勒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时代精神,它不仅存在于统治者的思想意识深处,而且体现在包括建筑、科技、女权主义思想等社会文化现象的许多方面。他认为,“极权主义的本质是控制和消解。它消解人的个性、多样性、异议、极端的可能性和浪漫的信念;它蒙蔽人的想像力、顿挫人的直觉、抹煞人的过去。”它的目的是要把人们变成具有统一的意识、统一的信仰和行为,毫无个性的、托马斯·品钦所谓的“合成人”,把美国社会变成一个乏味无知、统一顺从的集体。如果说《裸者与死者》是他对于美国战后可能出现的极权主义的第一次警示的话,那么《奥斯瓦尔德的故事》(1995)则是他对于极权主义的最新关注。

梅勒作为时代的代言人,他不仅以独特的视角反映了美国战后社会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且作为批评家眼中的当代惠特曼,或者他自己心目中的救世主弥赛亚,梅勒早在他的杂文集《我自己的广告》(1959)中就抒发了他的远大抱负:“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掀起一场革命。”因为像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一样,梅勒相信他的文学作品能够通过冲击人们的灵魂,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从而

影响并改变美国的历史,尤其是思想文化历史。他在作品中反复表征的嬉皮士哲学,以及他关于女人、性、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等方面的独特叙事都曾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强烈地震撼并动摇了他们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因此长期地把他自己置于美国文化圈口诛笔伐的中心。他的作品也因此而渗透到美国思想文化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

然而,梅勒的写作风格和他的作品中所反映的历史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本书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梅勒对于“新新闻体”和非虚构小说的探索和实践,以及他对于历史与小说、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的职责之间传统界线的思考和有意识的颠覆,使他与罗伯特·库弗、E. L. 多克托罗等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一起开始了对历史——这个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谓的“元叙事”——在实践层面上的解构和重塑工作。

在梅勒的作品中,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由于在被叙述和被描写过程中渗入了梅勒作为叙述者的自觉意识而呈现出明显的主观性和虚构性。历史事件的小说式叙述,以及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的虚构性联系使读者在意识深处产生一种强烈的困惑和焦虑:历史到底是什么?这正是许多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以及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理论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本书在第二章,“梅勒历史的文本性”,所要探讨的问题。它不仅通过探讨梅勒文本中对于历史人物的虚构性表征,引发读者对于后现代语境中历史现状的思索,而且还将分析梅勒在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所采用的元小说和互文性的叙事技巧,从而加深读者对于历史及其悖论性表征手法的认识。

在后现代主义批评语境中,历史不仅走下了旧历史主义批评的圣坛,并从各种各样形式主义批评的文本边缘浮现出来。一些后现代主义批评家认为,历史不再是客观的、权威的、具有唯一参照性的“宏大叙事”,也不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与文学文本毫无关系的话语存在形式。它与文学文本一样是一种文本、一种叙事。因此它与文学文本一样具有主观性和虚构性。作为对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反拨的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把历史的这种状况定义为“文本性”。历史事实只存在于文本踪迹之中,人们只有通过不同的

文本才能了解历史。

可以说梅勒在对于“历史的文本性”的认识和实践方面与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存在着最为明显的共识。如果梅勒长达50多年的创作生涯可以被分为两个阶段的话,本书认为他与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这种认同,即对于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虚构性表征标志着他创作理念的转变以及与后现代主义的认同。从出版于1965年的《一场美国梦》开始,历史人物就开始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并与小说中的虚构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读者无法从传统的认识范式去感知历史。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梅勒小说中的形象。通过大胆的想像,梅勒把历史事实和虚构情节融合为一体,完全打破了事实与虚构,历史与文学的传统界限。梅勒把历史事实与文学虚构混为一谈的另一种策略是推测。梅勒作品中的所谓历史往往是他的个人体验和他从各种各样的信息来源中精选出来的貌似客观可信的史料的混合体。玛丽莲·梦露、盖瑞·吉尔莫、李·奥斯瓦尔德的传记都是这样的历史。

约翰·肯尼迪、玛丽莲·梦露、盖瑞·吉尔莫、李·奥斯瓦尔德等历史人物在梅勒的小说或非虚构小说中的频繁出现造成了罗伯特·库弗所谓的对于历史的“不可思议的干扰”效果,使读者意识到历史和小说没有什么区别,二者都是可以被任意书写的文本。这种意识确实读者的精神上造成一种莫名的焦虑。而诺曼·梅勒在他塑造历史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元小说和互文性的叙事手法则加剧了读者的这种焦虑和不安。

梅勒采用的元小说叙事手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梅勒在他的非虚构小说的结构安排上明显地体现出叙述者的参与痕迹。这种参与具体体现在他对于琳达·哈钦所说的包括脚注、注解、前言、后序、标题、副标题等“超文本”形式的使用上。梅勒往往在这些“超文本”中表明作品的题材,或说明作品中所应用的材料来源,或解释他写这部作品的前因后果等。梅勒的元小说叙事手法的另一个体现是梅勒作为叙述者的声音直接出现在他的非虚构小说的叙述过程中。这种叙述者声音的闯入打断了文本叙述的正常逻辑,干扰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于文本中所描述的事物或观点产生认同的可能性,因为这使读者能够非常明显地意识到他所阅读的只不过是作者

虚构的小说而不是历史。无论是采用了“超文本”形式的结构安排，还是梅勒在叙述过程中的直接介入都造成了梅勒关于历史叙事的一个悖论：他在试图告诉读者他的叙事是客观的、真实的同时，又透露出他主观和虚构的痕迹。

梅勒的另一个造成同样的叙事悖论的艺术手法是互文性。在他的作品中，尤其是在他的小说体传记《玛丽莲》、《刽子手之歌》和《奥斯瓦尔德的故事》中，梅勒摘录了大量其他的文本片断。它们主要有剪报、书面和录音访谈、政府的监视纪录、书信、日记、照片以及其他小说的部分篇章。很多时候，梅勒似乎并没有在进行文学创作，而只不过是在对其他的文本进行重新编辑而已。梅勒的这种做法在努力展示叙事的客观真实性的同时，又在自相矛盾地暗示读者，历史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文本之中，我们只有通过文本才能了解历史。

如果说本书的第一章“梅勒文本的历史性”和第二章“梅勒历史的文本性”探讨了梅勒与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关于文学与历史的两大共识的话，本书的第三章，“梅勒文本的政治意识”，则研究了梅勒与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最后一个共识，即文本的政治性问题。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在赞同“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概念的同时，也都认为文学文本是权力关系的载体，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矛盾和斗争。然而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理论最大的分歧点在于：新历史主义批评认为在权力关系的矛盾斗争中，颠覆者的颠覆行为只不过是权力存在的体现，它服务于统治者的权力，最终将会被代表着权力的一方所抑制；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则认为颠覆者的颠覆行为存在着一定的成功的可能性。本章将分别以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理论为指导对梅勒小说中的权力关系和政治斗争的策略和结果进行分析研究。

本书认为梅勒的小说几乎都是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所谓的权力关系的载体，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矛盾和斗争。从《裸者与死者》中法西斯主义者卡明斯和克罗夫特与自由主义者哈恩之间的斗争，《巴巴里海岸》中极权主义的政府代表豪林沃斯与马克思主义者麦克利奥德之间的较量，《鹿苑》中好莱坞巨头泰皮斯与剧作家埃特尔特之间的冲突，《一场美国梦》中集各种权利于一身的凯

利及其女儿蒂博拉与向往自由的嬉皮士罗杰克之间的对抗,《我们为什么呆在越南?》中崇尚个性与自由的主人公 D. J. 对于公司权力的代表、他的父亲杰斯路,以及令人窒息的大众传媒文化的反抗,《刽子手之歌》中的杀人犯吉尔莫对于美国的行刑体制以及《哈罗特的幽灵》中的哈伯特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规则的藐视,到《奥斯瓦尔德的故事》中奥斯瓦尔德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的不满,无不显示了梅勒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对于美国政治的关注。

然而,在这些二元对立的矛盾关系体中,颠覆者对于代表着权力的另一方所进行的颠覆行为却有着不同的结果。有的颠覆行为正如新历史主义批评所认为的那样,只不过是权力一方用来彰显他们的权力和加强他们的统治的一种手段,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而另一种颠覆行为则如文化唯物主义批评所认为的那样,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虽然这种成功还显得非常的微弱。在本书看来,这种失败和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分水岭,那就是梅勒的“白色的黑人”(1957)一文的发表,它标志着梅勒的嬉皮士哲学思想的形成。在此之前,梅勒往往为他小说中的颠覆者从政治思想方面寻找一种成功的途径,却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而在此之后,梅勒为他的反叛英雄们提供了一种强调个性与本能反应、崇尚性与暴力的、崭新的存在主义生存哲学,为他们指明了一条通向成功的蹊径。

梅勒对于美国政治生活的关注与思考使许多文学批评家对他赞不绝口。他们把梅勒看做是具有敏锐的政治意识的优秀作家。的确,美国在世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像梅勒那样把自己的写作主题与美国的政治活动联系得如此紧密。

梅勒作品中强烈的政治意识以及他对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的思考和表征,使他明显地区别于索尔·贝娄、约翰·厄普代克等美国当代小说家,也同样区别于约翰·巴思、罗伯特·库弗和 E. L. 多克托罗等比较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梅勒在 50 多年来的文学批评中曾被冠以诸如“我们的惠特曼”、“文学社会学家”、“文学恐怖主义者”等诸多头衔,但是本书认为,罗伯特·比基宾对于梅勒的评价——“后现代的异端”——也许是最恰当的。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理论虽然在美、英两国仍然方兴未艾,但是由于新历史主义的创始人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越来越

偏好“文化诗学”这个新名称，而这两种批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如乔纳森·多利莫尔和艾伦·辛菲尔德等开始转向其他诸如后殖民批评、女权主义等研究领域，许多批评家已经开始考虑“新历史主义之后”的问题了。不管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理论的命运将会如何，但是，在文学创作的许多方面与这两种理论不谋而合的诺曼·梅勒的命运是确定的：他将成为美国战后文学宝库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作家。

目 录

序	001
前言	001
Introduction	001
Chapter One	
The Historicity of Mailer's Texts	039
I. The Spokesman-Hero: Positing at the Center of History	045
II. The Dotty Messiah: Making a Revolution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Our Time	075
Chapter Two	
The Textuality of Mailer's History	104
I. Magical Disturbances: The Fictional History in Mailer's Works	111
II. Metafiction and Intertextuality: Mailer's Strategies in Constructing Fictional History	131
Chapter Three	
The Political Commitment of Mailer's Texts	166
I. Subversion and Containment: A New Historicist Study of Mailer's Power Relations	175

